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这是瘟神笼罩下的世界的真实写照。

民众、医生、卫生官员、地方官员、国家领袖，

各个阶层，都与这让“华佗无奈”的小虫发生了关系。

其后，呈现出的是疾病与社会、疾病与政治的关联。

疾病、社会与国家

20世纪长江中游地区的血吸虫病灾害与应对

Disease , Society and the State

The Disaster and Response of Schistosomiasis in the middle Reach of Yangtze River in 20th Century

王小军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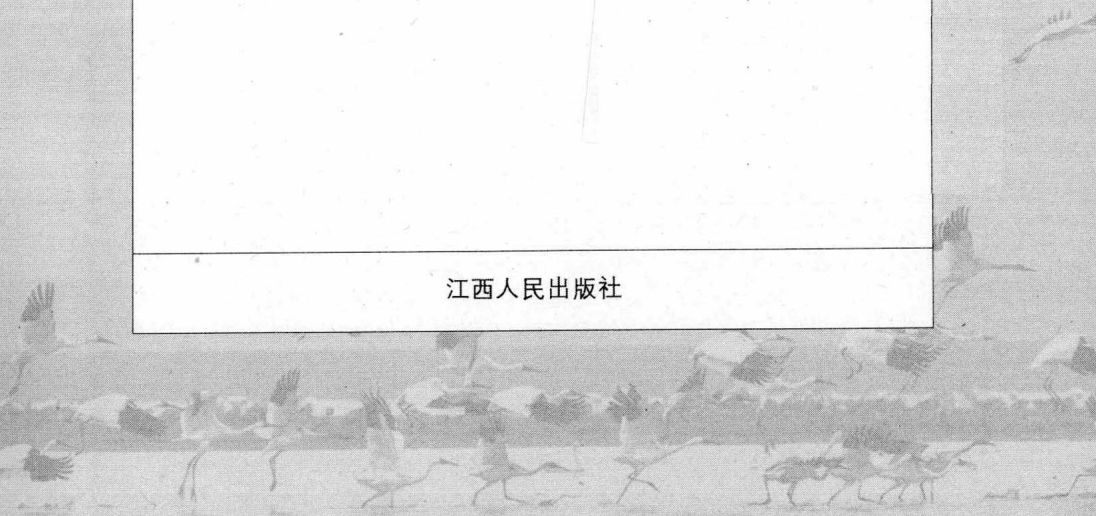
疾病、社会与国家

20世纪长江中游地区的血吸虫病灾害与应对

Disease , Society and the State
The Disaster and Response of Schistosomiasis
in the middle Reach of Yangtze River in 20th Century

王小军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疾病、社会与国家:20 世纪长江中游地区的血吸虫病灾害与应对/王小军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12

ISBN 978 - 7 - 210 - 04991 - 3

I. ①疾… II. ①王… III. ①长江 - 中游 - 血吸虫病 - 防治 - 研究
- 20 世纪 IV. ①R532. 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4411 号

疾病、社会与国家

20 世纪长江中游地区的血吸虫病灾害与应对

作者:王小军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邮编:330006)

发行部电话:0791 - 86898801

编辑部电话:0791 - 86899010

E - mail:taxue888@foxmail. com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330 千字

ISBN 978 - 7 - 210 - 04991 - 3

赣版权登字—01—2011—29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38.00 元

承印厂:南昌市印刷九厂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言

严昌洪

这是一篇关于疾病医疗史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疾病医疗史,不论对学生还是对老师,都是一种挑战。因为我们虽然有过疾病,也看过医生,但关于疾病医疗的专门知识却是缺乏的。作者王小军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是关于景德镇制瓷业行业神崇拜的研究,转到血吸虫病史研究上来,是要有勇气的。

他迎难而上,努力熟悉血吸虫和血吸虫病的专门知识,厘清疾病医疗史的学术前史,深入田野进行调查,广泛搜集各种资料,为论文写作作了较为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史料储备。

在系统回顾学术史的基础上,作者中肯地提出了当前史学界疾病史研究的三点不足:一是重视烈性疾病研究而忽视慢性疾病研究;二是存在以社会史视角为主的方法单一的现象;三是研究路径多以“事件

史”为出发点,而对平时单种疾病预防治理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点评前人研究中的不足,无疑是给自己的论文写作设置了三道高门槛。开始我很有些担心,怕他眼高手低,像某些博士论文那样,把别人的不足罗列一堆,而自己却并未在写作中弥补这些不足。但读了他的论文后才知道,这三道门槛基本被作者跨越,论文在三个方面有不同程度的突破,多少弥补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不足。

史学界涉足血吸虫病史研究的人并不多,因为这种病是一种慢性的、地方性疾病,不像突发性瘟疫如鼠疫、霍乱等那样有强烈的社会反应,成为一时的全局性热点,从而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关于血吸虫病的资料极度匮乏,增加了研究难度。作者在“冷门”中找到一个可以进入疾病医疗史“热点”的“漏网之鱼”,犹如在“贫矿床”上寻找到一个“富矿段”,他选取 20 世纪长江中游地区血吸虫病疫情及其防治作为自己从事疾病医疗史研究的突破口。由于找得准确,收获是显而易见的。他以这个时段这个区域的血吸虫病为研究对象,通过社会史和政治史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对历史上的疾病与社会、疾病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得以提出一些颇有新意的见解。

疾病医疗史本来是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但作者不满足于考察血吸虫病对该时段该地区人口、经济社会的影响,而进一步从政治史的视角,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消灭血吸虫病运动与国家政治动员的关系,分析随后出现的防治血吸虫病与各种政治运动结合的过程,以揭示消灭血吸虫病背后所隐藏的政治动员意图。这就拓宽了疾病医疗史研究的视野,增加了论文的深度,为疾病史研究中将社会史与政治史两种视角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做了有益的尝试。

过往的疾病医疗史研究因为多关注爆发性的瘟疫,重点放在考察疫病来临时如何应对,即如何控制、扑灭,如何阻止其蔓延,而对平日预防疫病发生的举措,包括环境的治理、传染源的消除、疫苗的接种、防疫知识的普及等等关注较少。而本论文作者则在考察政府和民间平时防治血吸虫病的应对机制方面下了比较多的功夫,从而体现了作者的人文关怀意识,并使论文具有强烈的现实借鉴意义。像 2003 年 SARS 那样大规模爆发性传染病的发生毕竟是少有的,而长期坚持不懈地防止

诸如血吸虫病、麻风病等慢性传染病对广大民众健康的侵蚀更值得关注。但愿在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的今天,国家和社会给予仍被各种慢性疾病折磨的群众以更多的关怀。

王小军博士学位论文即将出版,他向我索序,写了以上一些感想,权作一篇小序吧。

2011 年国庆节于桂子山忍斋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①

① 毛泽东：《送瘟神二首》，《人民日报》，1958年10月3日。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了新闻《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称:江西余江县在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战线上插上了第一面红旗——首先根除了血吸虫病,给祖国血吸虫病科学史增添了新的一页。科学家们认为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①当时正在杭州开会的毛泽东读了这则消息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②,写下了上述的著名诗作《送瘟神二首》。

是什么原因使得在小小的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就让曾经筚路蓝缕的建国领袖如此豪情大发?难道血吸虫病是世界上一一种很独特的病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到主席大发感慨的时候,血吸虫病已经在世界上持续了几千年,并且还流行于地球上的74个国家。是血吸虫病特别难以防治吗?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因为余江县从开始防治到彻底消灭所花的时间也只不过用了六、七年的时间而已。

其实,相对于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来说,血吸虫病具有发病地域性、得病缓慢性及病情持久性等特点,因此,它的爆发不像鼠疫等烈性传染病那样能够立即引起国家与社会的重视,它只有在病情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引起关注。同时,要治疗血吸虫病也不是单靠医疗手段就可以解决的,它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在一个较长时间段的努力下才能完成。因此,在民国时期,中国的血吸虫病就已经积累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了,疫区范围广阔,感染人数、疫死人数都非常之大,1935年的《内政年鉴》就记载说“此病分布于吾国各地,幅员甚广,沿扬子江上下游各省无不波及”、“以此病流行区域总计算,则吾国农民患者不下一千万人”。^③但是,民国年间长江流域一千多万人得血吸虫病的惨状,虽然也引起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卫生部门注意,但当时在解决该疾病时却是方法不多,仅是用医疗手段在有限的几个地方开展了一些活动,根本

① 陈秉彦,刘光辉:《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人民日报》,1958年6月30日。

② 毛泽东:《送瘟神二首》,《人民日报》,1958年10月3日。

③ 国民政府内政部:《内政年鉴》之“卫生篇”,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没有起到作用,以至于形成“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局面。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成立的政权在卫生领域首先就关注到了血吸虫病,在新中国成立初年,中央人民政府在得到各疫区对血吸虫疫情发展的汇报后就指示卫生部要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而在1955年,毛泽东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此后,在全国的血吸虫病疫区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而最轰轰烈烈的莫过于“灭螺运动”了。在毛泽东的《送瘟神二首》诗发表后,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卫生运动达到了高潮,不少县级疫区也在这个运动的推动之下先后消灭了血吸虫病。

因此,本书便选取长江中游地区的血吸虫病作为研究对象,尝试解决以下一些问题:在20世纪,血吸虫病到底给长江中游地区带来了什么样的危害?它对疫区的人口和社会经济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是诗人的夸张还是真实的写照?同时,民国时期的国家和社会又是怎样应对血吸虫病的,他们具体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成效又是怎样?建国后新政权又是采取怎样一些方式和步骤来应对和治理血吸虫病的?又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唐纳德·莱特说过:“医疗保健和卫生服务是政治哲学的体现。”^①那么,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消灭血吸虫病的卫生运动的背后,体现了什么样的政治哲学?而疫区的人民群众在这个政治哲学下面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等等。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一、疾病史研究:从历史学的“漏网之鱼”到历史学的学术热点

(一) 历史学的“漏网之鱼”:1990年前的疾病史研究

其实,疾病史的研究最早源于医学界。20世纪初,医史学逐渐发展成为医学下面的一个分支学科,疾病史的研究自然也多了起来,但是

① 转引自[美]威廉·科克汉姆:《医学社会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当时大部分疾病史的研究还是被涵盖在整体医学史的研究当中,如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医学通史《中国医学史》就十分重视疾病史的研究,里面不仅专门设有疾病史章节,而且特别强调疾病史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医学史是一种专门史,研究必须分三类:第一类关于医家地位的历史;第二类关于医学知识的历史;第三类关于疾病的历史”。^① 1936 年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正式成立后,中国的医史学界对于疾病史的研究更为活跃,如当时李涛对结核病史、宋大仁对消化器病史、于景枚对痘疮史都进行过探讨。^② 此后,随着医史学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几乎各种疾病的历史都有研究者涉及,形成了一个比较繁荣的景象。然而,这种繁荣的背后却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医史学界对疾病史研究的内容和途径都相对狭窄,在主要内容方面,多为研究人类认识疾病的历史过程与规律,常涉及病名、病因、病理、病候、诊断、治疗、流行病学等诸多方面,而在研究途径方面,一般也就遵循两条:一是以现代病名界定,可为世界医学、中西医结合提供史据,为祖国医家对人类贡献正名;二是以传统病证名界定,可为发展中医学术、实现中医现代化提供经验。^③ 这种研究并没有触及疾病背后的社会,如疾病来临时,其带来了什么样的危害,国家和社会又是怎样应对的,而民众在面对疾病时又是怎样的一个心态,等等。要解释这些问题,显然需要历史学科的参与。但是,在历史学的领域里,疾病史研究却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根本就没有占据它应有的位置,成了历史学的一条“漏网之鱼”。^④

疾病史研究虽然是历史学的“漏网之鱼”,但并不是说从来就没有历史学者涉足过疾病史的研究,只不过是研究的成果非常零散而已。中国史学界早期的疾病史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将其涵盖

①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绪言”第 2 页。

② 李涛:《中国结核病史》,载《中华医学杂志》第 25 卷第 2 期,1939 年 2 月;宋大仁:《中国消化器病史概说》,载《中华医学杂志》第 25 卷第 11 期,1939 年 11 月;于景枚:《痘疮源流》,载《中华医学杂志》第 27 卷第 11 期,1941 年 11 月。

③ 靳士英:《疾病史研究 60 年》,载《中华医史杂志》,1996 年第 3 期。

④ [美]麦克尼尔著,杨玉龄译:《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版,第 1 页。

在整个中国灾荒史研究中,如邓云特在进行中国灾荒史研究时,就对中国历史上的疫灾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不仅理清了中国历代所存在的重大疫灾,而且对每个世纪所发生的疫灾频次也进行了总结,同时他还对中国历史上的防疫措施进行了探讨;^①另外一种就是单篇的疾病史研究论文,如史学家陈寅恪早期曾著有《狐臭与胡臭》,^②20世纪40年代考古学家胡厚宣也撰写过《殷人疾病考》,^③到了50年代,史学家罗尔纲也发表了《霍乱病的传入中国》一文。^④虽然先后有多名史学家涉足疾病史研究,但史学界对疾病史的研究始终没有活跃起来,更没有很大的建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西方对疾病史研究的兴起都还没有什么改观。

(二)“疾病改变历史”:1990年至2003年的疾病史研究

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少数医史学家从只关注疾病认识、诊断和治疗等的研究开始转向疾病社会史、疾病文化史的研究,强调疾病史研究中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这对接受了法国年鉴学派等新编史学理论影响的西方史学界以巨大的震动,从而使得历史学家们也开始涉足疾病史的研究,并出了不少研究成果,如《疾病改变历史》《瘟疫与人》等。《疾病改变历史》是由医史专家和历史学教授合作完成的,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完全跳出了传统医学史研究框架,开启了历史社会学的视角。^⑤而同期的《瘟疫与人》也对西方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书在研究中也采用了历史社会学的视角,“从史学和流行病学的观点,藉由敏锐机智的观察和推理,娓娓道出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⑥从这个时期起,疾病史研究就成了西方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不少历史系都拥有了专门研究

①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② 陈寅恪:《陈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③ 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④ 罗尔纲:《霍乱病的传入中国》,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

⑤ [英]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迈克尔·比迪斯,陈仲丹、周晓政译:《疾病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⑥ 陈建仁:《古今往来话传染病史》,见麦克尼尔:《瘟疫与人》,“导读”第1页。

疾病史的学者,以至于会让中国学者留下“欧美大学的历史系都非常重视医学史研究,将其纳入通常的研究范围”的深刻印象。^①

由于中外交流不畅的原因,西方史学界掀起的疾病史研究热潮当时并没有影响到中国,中国史学界对疾病史的研究还是没有重视乃至注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80 年代末期。随着中西方学术交流的加深,以及中国史学界对“史学危机”的不断反思,疾病史研究才开始冲击有关学者的观念,如较早从事疾病史研究的曹树基教授就回忆说在获得用疾病解释历史这一视角后久久不能释怀,用疾病来解释中国历史对于他而言就成了一块新大陆。^②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史学界对疾病史的研究也开始了较多的关注。比较有意思的是,当时史学界较早关注的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疾病,而是中世纪时期欧洲的黑死病,如张绪山在 1992 年就重点探讨了黑死病对欧洲社会的影响。^③此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注意到了疾病史这个研究方向,并将此引入中国历史的研究当中来,随之出现了一些有关疾病史研究的成果,如杜家骥、曹树基、谢高潮、梅莉、晏昌贵、龚胜生等人先后发表了相关论文,^④尤其是曹树基的《鼠疫流行和华北社会变迁(1580-1644)》一文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反应,该文摆脱了以往研究明史往往只考虑政治斗争、阶级冲突和民族对抗的传统视角,而是通过对生态环境的异常变化这个视角来分析明王朝灭

① 陈仲丹:《译者后记》,见《疾病改变历史》,第 266 页。

② 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 年)》,山东画报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4 页。

③ 张绪山:《14 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 年第 2 期。

④ 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李中清、郭松义编:《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曹树基:《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谢高潮:《浅论同治初年苏浙皖的疫灾》,载《历史教学问题》,1996 年第 2 期;梅莉、晏昌贵:《关于明代传染病的初步考察》,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5 期;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变迁(1580-1644)》,载《历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梅莉、晏昌贵、龚胜生:《明清时期中国瘧病分布与变迁》,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 年第 2 辑。

亡的原因,文章指出:万历年间的华北鼠疫大流行使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崇祯鼠疫则在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中加速了它的传播和扩散,因此,明王朝是在灾荒、民变、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这个“老鼠‘消灭’了明朝”的结论使得中国大陆史学界真切体会到了“疾病改变历史”的意境。^①而在1998年,史学界出版了第一部研究疾病史的专著《三千年疫情》。该书从先秦谈起,一直谈到清代,对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的疫情、医家治疫、国家应对等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使读者对整个中国历史上的疾病与社会的关系有了系统的了解。^②

正是这些成果的推出,使得疾病史研究进入了更多的历史学者视野当中。在随后的几年,更多的学者进入了疾病史研究的领域,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有年轻学者余新忠和李玉尚等人。余新忠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涉足疾病史研究,并在2000年完成了中国史学界第一篇疾病史方面的博士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③该论文在完成后,获得了史学界极高的评价,其导师冯尔康先生将此论文认定是“我国大陆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④,而早于大陆进行疾病史研究的台湾史学界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本书无疑是大陆学界近年来的第一部重量级‘医疗社会史’专著。”^⑤此后,余新忠关于疾病史研究的论文更是不断,仅在2001—2003年间,就发表疾病史研究方面的论文十余篇。李玉尚也是同期进入疾病史研究领域的一位重要学者,需要注意的是,他所进行的疾病史研究都是在清晰

① 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第102页。

② 张剑光:《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

③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序一(冯尔康),第V页。

⑤ 蒋竹山:《〈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书评》,台北:《新史学》,2003年第4期。

的现代医学框架中展开的,而余新忠则对此不太赞同。^①李玉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上,几年下来或单独完成或与人合作完成了多篇疾病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并在2003年完成了以疾病史为选题的博士论文《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年)》,该论文通过对近代江南地区的传染病研究,说明近代江南的历史,既是环境、病原体与人相互影响的历史,也是环境、病原体与人相互作用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公共卫生成为国家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环境、病原体与人的关系也因此达成新的平衡。^②

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面世,疾病史研究在史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疾病被研究者关注,疾病史研究进入到一个发展的快车道。由此看来,“疾病”这个问题正在悄然改变着中国史学界的研究状况。

(三) 历史学的研究热点:2003 年后的疾病史研究

正是因为史学界对疾病史研究的深入,使得人们进一步理解了疾病和社会的关系,而他们研究所得出的“疾病改变历史”、“疾病磕绊历史”之类的结论刚好在2003年“非典”爆发时得到了一定的印证,这使得史学界对疾病史的研究进一步活跃,有两个现象就是例证:一个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疾病史的研究行列,这从每年的硕博士论文选题就可以看出来,如笔者在中国知网的中国优秀硕博士论文库粗略一检索,就发现2003年至2005年间就有不少有关疾病史研究的学位论文;另一个就是随着疾病史研究的日趋活跃,专门针对疾病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也开展起来了,如2006年8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就组织召开了题为“社会文化视野下的疾病医疗史研究”的国际研讨

① 余新忠反对将历史上所发生的疾病与现代医学强行对应,认为现代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分属两个迥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对应的话很可能出现问题。具体可参见余新忠:《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在与可能》;而曹树基和李玉尚等人则不太认同余新忠的观点,他们在研究中坚持将资料放在清晰的现代医学的病种框架中展开讨论,具体可以参见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第10—11页。

② 李玉偿(尚):《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年)》(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2003年。

会,这在国内史学界尚属首次。以至于有关媒体在评论 2006 年度的学术热点时就指出“环境史研究异军突起”,其论据就是用疾病史研究状况来说明:“近年来‘非典’、疯牛病、禽流感等疾病的流行,也促使人们开始关注历史上各种应对机制的是非成败,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①由此可以看出:疾病史研究在中国史学界已经完成了从“漏网之鱼”到“学术热点”的转变。

当疾病史研究成为史学界的研究热点后,其研究主题、研究视角及研究群体都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疾病灾害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当中。这个时段的疾病史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具体的疾病灾害研究持续活跃。不仅曹树基、余新忠、李玉尚等人还在继续着疾病史研究,而且新的研究力量在不断加入,新的研究主题不断被挖掘出来,如刘继刚对先秦时期疾疫的研究、王子今对汉晋时期瘴气的研究、杨齐福等对近代福建鼠疫的研究、陈松有对苏区的疫病研究、王元周对抗日根据地疫病的研究及李洪河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疫病的研究等等,^②不胜枚举。

第二,历史上的疾病防疫问题被发掘并成了研究重点。对于防疫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近代以来防疫观念形成及防疫制度建设的考察,如余新忠对晚清时期防疫观念形成的研究、谷永清对民国时期中国乡村防疫建设的研究、陈松有等人对苏区卫生防疫的

① 《光明日报》理论部、《学术月刊》编辑部:《2006 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见《光明日报》,2007 年 1 月 16 日,第 11 版。

② 刘继刚:《试论先秦时期的疾疫》,载《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 年第 3 期;王子今:《汉晋时代的“瘴气之害”》,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 年第 3 辑;杨齐福、杨明新:《近代福建鼠疫的传播与社会影响》,载《史学理论研究》,2007 年第 3 期;杨齐福、杨明新:《近代福建鼠疫的传播与社会影响》,载《史学理论研究》,2007 年第 3 期;陈松有:《20 世纪 30 年代苏区的疫病流行与防治》,载《甘肃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 期;王元周:《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疫病流行与群众医疗卫生工作的展开》,载《抗日战争研究》,2009 年第 1 期;李洪河:《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

研究、李洪河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防疫事业的研究都属于这种情况;^①另一是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如曹树基通过疾病控制来考察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彭善民对近代上海的公共卫生与都市文明关系的探讨、何小莲对1927—1930年间上海公共卫生的考察等都属于此类。^②

第三,在中国疾病史研究热潮的推动下,世界史范畴的疾病史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如陈志强对查士丁尼瘟疫的研究、毛利霞对19世纪英国霍乱的研究、邹翔对近代英国鼠疫的研究、赵秀荣对近现代英国医疗立法的研究等等。^③

第四,疾病史研究视角逐渐多元化,研究不再集中于疾病的危害及社会如何控制疾病这些方面,而是从多个视角来解读历史上的疾病,如杨念群的疾病政治史研究、何小莲的疾病文化史研究、龚胜生等人的疾病地理史研究等等。^④

① 余新忠:《从避疫到防疫:晚清因应疫病观念的演变》,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谷永清:《试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防疫建设》,载《求索》,2008年第5期;陈松有、刘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卫生防疫》,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8期;李洪河:《建国初期的卫生防疫事业初探》,载《党的文献》,2006年第4期。

② 曹树基:《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何小莲:《冲突和合作:1927—1930年上海公共卫生》,载《史林》,2007年第3期。

③ 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考辨》,载《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影响初探》,载《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毛利霞:《疾病、社会与水污染——在环境史视角下对19世纪英国霍乱的再探讨》,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6期;邹翔:《近代早期伦敦医疗界对鼠疫的应对》,载《史学月刊》,2010年第6期;赵秀荣:《近现代英国政府的医疗立法及其影响》,载《世界历史》,2008年第6期。

④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龚胜生、刘杨、张涛:《先秦两汉时期灾疫地理研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3辑。

二、史学界的疾病史研究范式:社会史向文化史、政治史的扩展

史学界的疾病史研究起步虽然晚,但发展快,为了从更加宽广的视角去解释历史上的疾病问题,其研究范式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实现了从社会史向文化史、政治史的扩展。

(一)社会史范式下的疾病史研究

对于中国史学界来说,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展疾病史研究的原因固然有受西方史学界影响,但其深层原因却是当时史学界对自己领域研究进行反思的结果。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历史研究主要由政治、经济、思想三大块构成,学术重心为阶级斗争史,使得历史研究形成了一套僵化死板的思维模式,研究领域狭窄,课题单调,历史学完全陷入困境。到了20世纪80年代,“史学危机”成了历史学界的一个大问题,学术界也开始对以往研究进行反思,其结果就是突破了阶级分析是认识中国历史的唯一方法的僵化观念,把认识社会的目光扩大到了多种社会关系、社会群体和社会生活,让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并且要适应“当今世界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互相渗透”这一大趋势,借用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等手段来研究历史。^①反思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一大批新的研究领域作为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被发掘出来,如下层群体生活、民间信仰、灾害与救济、心态史等等,在这些研究领域被越来越被细化的时候,疾病史研究就被史学界所关注起来。所以,史学界疾病史研究的最早范式就是社会史框架,这一点,台湾史学界也是如此,如杜正胜就把台湾史学界最初的疾病史研究看做是“新社会史”,并重点提到“所谓新社会史是以过去历史研究所重视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为骨干,傅益着人的生活 and 心态,使历史学成为有骨有肉、有血有情的知识”,因此“把医疗史当作社会史来研究以弥补以往史学的缺憾,

^① 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